

日治時期考古學家身影

文·圖片提供／劉益昌（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山崎柄根著，楊南郡譯註《鹿野忠雄：縱橫臺灣山林的博物學者》封面書影（1998，晨星出版社）。

▲影響日本考古學甚深的大森貝塚相關書目書影之一。（加藤綠《日本考古學の原点》2006，新泉社）

取大量的考古標本大多存於森氏後來任職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今臺灣博物館）。當代臺灣考古學者對日治前期考古學的認識，不少資料來自於森氏的紀錄或發現，例如巨石文化（今稱麒麟文化）的石壁、岩棺等，即森氏在東海岸所發現的。

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正式成立，從考古學、人類學研究角度，學術界與總督府得以分庭抗禮，考古學研究走入以學術研究為主時期。在此同時，後期重要學者鹿野忠雄也在1925年進入臺北高校就讀，開始發表有關臺灣生物學、地理學論文。

在前後期分野間有位重要學者，他是任職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的宮原敦。他在1919年發表有關圓山遺址及大坵石研究的重要論文，1926年發表臺中州水底寮遺址的調查報告，並在臺北帝大成立後參與墾丁寮遺址的發掘（1931）；他也是總督府史蹟調查委員，撰述圓山遺址指定為史蹟的重要文件，可說是當時文化資產調查的重要學者。

後期（1928-45）學者，以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教室的移川子之藏教授，以及其助手宮本延人為學院代表。移川在臺工作主要是原住民調查與研究，也從事考古遺址調查與記錄。1931年，移川首先發

臺灣科學的考古學是從日治時期初年建立，至今一百多年來已有許多重要發現，可說奠基於日治時期。日治時期或日本學者對臺灣考古的研究，以臺北帝國大學建立的1928年，區分為前期、後期。

日本考古學是1877年由美國動物學家P.E.Morse發現大森貝塚開始，隨後引起考古風潮，東京人類學會會長坪井正五郎即受此風潮影響。在大森貝塚發現十八年後，日本領有臺灣，派來相當數量的不同學科學者來臺進行各類資源與文化調查，做為治臺所需的知識體系。其中前期（1896-1928）人類學者大多受

此風潮影響，如鳥居龍藏、伊能嘉矩都曾參加東京人類學會，受坪井正五郎影響。

鳥居龍藏（1870-1953）在1896-1900年間四次調查臺灣，除進入山區與東海岸調查原住民外，也記錄考古遺址，曾針對圓山遺址發表重要調查報告，提出：臺灣考古遺址顯然不同於日本，遺址主人究竟是哪些人群所遺留？鳥居在臺從事調查時間不長，卻留下重要的開創性議題。

鳥居的助手森丑之助，也是臺灣原住民研究、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學者。森氏在1902、1911年兩度發表臺灣遺址名錄，指出考古遺址分布的特性，所調查採

掘墾丁寮遺址，為臺灣考古發掘之始，也調查發表蘇澳新城、花岡山、崇德、二本松、宮下等多處遺址，並進行出土遺物的比較研究，例如巴圖型石器、網墜的研究。這些研究除理解臺灣外，也連結臺灣與太平洋地區。移川、宮本師徒也是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教室陳列室及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重要人物，除布設展覽，並編輯《南方土俗》雜誌，普及考古學知識。

此一時期真正影響臺灣較大的學者，是從未進入臺北帝大體系的「博物學家」鹿野忠雄。鹿野精通動物、植物學，以地理學做為其博士論文的基礎，發表大量考古學與民族學調查文章，更建立臺灣史前文化體系。由於其學術領域相當廣泛，得以從多方思維理解臺灣考古學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1929-30年，鹿野統計列表臺灣的考古遺址，並進一步調查建立各地不同的史前文化體系，例如從東部地區遺址的調查，指出臺灣地區玉器製造的體系，連結玉器和東南亞地區的關聯；有關塗紅陶器的研究，聯繫臺灣與菲律賓等東南亞地區。從鹿野的研究中，可理解臺灣在東南亞考古學與民族學研究中具重要關鍵位置，他在二戰末期選輯的《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中的論文〈臺灣在東南亞先史學上的地位〉，即敘述臺灣考古出土遺物的內涵和重要性。當前臺灣學者研究熱門的臺灣與東南亞間

的關係，早在1930年代就已由鹿野建立相當清晰的脈絡。

此外，臺北帝大解剖學教室的金關丈夫、地質學教室的早坂一郎教授，以及臺南女中的國分直一、高雄中學的土屋恭一、臺南二中的金子壽衛男等教師，都有重要的區域性研究成果，尤其是有關西南平原的研究，不但發現大量考古遺址，也建立起平原地區史前文化的初步系統。這些研究由國分直一在1943年帶到臺北師範學校本科，使該校培育出熟悉考古學調查的劉茂源、徐張水流等學生，成為戰後臺灣考古調查的生力軍。

就日治時期考古學研究而言，宋文薰曾引日本學者八幡一郎在金關丈夫與國分直一1979年出版的論文集《臺灣考古誌》，書末的解說中所說：「臺灣的考古學有今日的進展，應該視為日人研究五十年的積存及其向上發展的延長」，筆者雖不完全贊成此一說法，但戰後1945-49年間日籍學者金關丈

夫、國分直一、宮本延人留用在臺灣大學，擔任考古學教學，培育了第一代考古學者宋文薰、劉斌雄，影響了劉茂源、劉枝萬等1960年代之前臺灣考古學研究重要的主力學者，也將日治五十年間臺灣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完整的留給臺灣學術界。

戰後1945-63年可說是臺灣考古學的巨變與傳承階段，今日臺灣考古學具日本與美國雙重影響，可說奠基於此一重要階段。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宮本延人對臺灣考古學的傳承功不可沒。



▲鳥居龍藏田野調查的情景。（圖引自德島縣立博物館《德島の生んだ先覺者 鳥居龍藏の見たアジア》1993，德島縣立博物館）



◀日治時期「土俗人種學講座」標本陳列室。（圖取自臺大人類所簡介摺頁2004）